

封面设计：李葆竹



甘新出001字总193号(89)018号

兰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

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——屈原

“端午节”是中国人民相沿已久的一个节日，在这一天，凡有江、河的地方，都举行龙舟竞渡，家家并用箬叶裹米作粽子来过这个节日。相传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杀殉国，人民万分痛悼他，就用龙舟竞渡来争着拯救他，用粽子投到水中去祭他，以解蛟龙对屈原身躯的侵害。这样的节日和行事，从屈原死的那年起，到今天一直继续了二千二百三十一年。足见人民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崇敬与热爱。

屈原名平，生于公元前三四零年的正月七日，死于二七八年的五月五日，正当强大的楚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。他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，曾任楚王的左徒，是职位相当高的国王左右的近臣。这时，他看到在秦国威胁下楚国危机的严重，积极主张改良内政，任用贤能，联合齐、魏以抗秦自保。这种主张，在当时是非常符合于楚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与愿望的。但是，楚怀王与其左右的一群自私自利的人，不仅不接受屈原的意见，反而疏远、排斥了他。屈原虽曾坚持自己的理想，向他们进行过斗争，但并无补于当时的局势。结果，怀王终被秦引诱去而囚死，怀王之子顷襄王更加软弱而糊涂，在秦国对楚国的压力愈益加

强之下，楚国终于走向灭亡的命运。楚国这种悲惨的命运，乃是屈原曾经努力争取挽救过的，也是屈原誓死不愿看到的命运。

屈原之所以如此关心国事，终于以身殉国，是和他一贯地、积极地热爱人民、热爱祖国和乡土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。他看到在内政不修、外侮日迫下的楚国人民的痛苦生活，在《离骚》中曾唱出这样的诗句：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！”（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，我长太息地禁不住要洒雪眼泪。）当他被疏远、排斥之后，志不得行，一时愤而有去国远引之心，但是，他想到人民灾难的深重，又复隐忍的留居下来，力图找机会挽回这种局势，并希望有所建树。如《抽思》中所说：“愿摇起而横奔兮，览民尤以自镇”。（想率性离开故乡，跑向国外，看到人民的灾难又镇定下来。）

至于他热爱祖国和乡土的心情，也一再从作品中真切的流露了出来。如《离骚》中说：“岂余身之惮殃兮？恐皇舆之败绩。”（我并不怕自己的身子会要遭殃，我怕的是君王的乘舆要被毁坏。）在这两句诗里，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只要祖国得以保全，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即至楚国的国都“郢”被秦将白起攻陷的时候，他在流亡途中，曾通过《哀郢》《抽思》等诗篇，倾诉他对郢万分沉痛的悼念。那里有他祖先的坟墓，有和他共同命运和呼吸的人民，他又如何能淡然忘怀呢！他对郢都的悼念，有时竟形诸梦寐。如在《抽思》中说：“惟郢路之辽远兮，魂一夕而九逝。”（郢都的路途确是遥远，梦魂一夜要走九遍。）他对于祖国和乡土这样深厚而真挚的感情，是如何亲切有力地感

染着我们啊！在《哀郢》的乱辞中他甚至于还这样说：“鸟飞反故乡兮，狐死必首丘。（飞鸟一定要归巢，狐死，头向着山岗。）屈原就是这样热爱、留恋他的祖国和乡土，他总想能重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即使死了也要回去。我们再看他的长诗《离骚》中，虽也有设想离去祖国的意念，但是，当他在空中忽然看到了祖国的时候，又舍不得离开。这种矛盾、痛苦的情绪，在其结尾的两句诗里完全可以体会出来的。如：“仆夫悲，予马怀兮，蜷曲顾而不行。”（我的御者生悲，马也开始恋栈，只是低头回顾，不肯再往前走。）什么力量使他不忍离开人民，离开祖国和乡土呢？什么感情使他的内心陷于这样的矛盾与痛苦呢？都可以从以上所引的诗句中，得到确切的答案的。

流传下来的屈原的二十三篇作品中，《离骚》为其最负盛名的长篇抒情诗，故事性也很强，对屈原的思想与作品的研究和理解，当以此为最主要。另外，相传《九歌》（包括变歌、挽歌和祭歌等成分）是根据沅、湘间民间祭歌加工整理而成的，可以证明屈原作品中所含有的民间口头创作的因素。另一篇奇特的作品《天问》，形式上是采用诗三百篇中的四言体，内容则是对古代的历史传说、宗教信仰、宇宙和人生观念等，都起了大胆的怀疑，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来，应该说是他不满足于现实的一种内心的反应。

历来对屈原作品的评价都是很高的，惯以“诗”“骚”相并称。它是上继诗三百篇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，同时，又以其创造性的天才，完成了诗三百篇后第一次诗歌形式上的一大革命，二者都直接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汉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。

由于屈原高度的热爱人民、热爱祖国和乡土的思想情感所决定的他的许多诗篇，在艺术性上也因而达到了空前的伟大的成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诗篇中虽充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，但是，它的基本精神却是为现实主义所贯串着的。谈到他的诗篇的艺术成就时，我们就可以想像到他政治和艺术的结合；丰富的想像与热烈的感情；神话传说的运用；地方色彩的浓厚；以及楚国的民间形式和民间语言的吸取等的天才的独创性。以上这些特点，构成了他的诗篇无比的宏伟与绚烂，成为中国人民最值得骄傲的，也最值得宝贵的遗产之一。所以对后代的影响极其重大。有不可数计的有成就的文人与诗人们，继承和发展了它们，汉以后中国许多伟大诗人的作品中，无论是在其思想与艺术各方面，都可以嗅到与屈原相同的气息。他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，也是中国第一个对后代影响最大的诗人。

屈原是二千多年以前的诗人，他的国家和他所坚持的理想，与我们今天皆是不相同的。但是，他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伟大的诗人。那就是：他有高度的、积极的热爱人民、热爱祖国和乡土的思想感情；他有坚持自己的理想，向断送楚国命运的人们作着顽强不屈地斗争的精神，并终于献出了他的生命。还有，他曾通过精莹不朽的优秀诗篇，无情地暴露了同一时代的黑暗与罪恶；以及他在文学上具有独创性的承前启后的丰功伟绩。这一切，使他成为中国人民所永远敬爱的伟大诗人。在今天，我们的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，我们的理想，是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。因而，我们的国家和理想，比起二千多年以前的屈原那个时代，就更感到是可爱的国家，更感到是应当坚持的理想。全中国

人民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照耀下，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时候，我们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，都应该学习他热爱祖国和人民，坚持理想的精神，为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，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！

被 酒 二 首

轻丝流管夜沉沉，旧梦低徊土满襟。

梅老尚存当日媚，春明难慰少年心。

断杯席上犹分酌，得句灯前莫浪吟。

我亦十年迟作赋，边关风雪竟于今。

已拌病酒春无奈，生悔情缘入世多。

塞上雪飞迷晓日，江南莺语挂新萝。

漫嗟二十聊如尔，敢道百年更若何。

似此宵深欣有月，要君痛饮为君歌。

（一九三六年）

《古诗词选读》前言

文学艺术都是起源于劳动的。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，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逐渐发达，于是便产生了思维和语言。向后就一步一步地形成了有韵律的诗歌，和有节拍的舞蹈，也就开始产生了文学艺术。

因此，也可以说原始的文学艺术活动是一种生产行为的再现，或劳动过程的回忆。本书所选的第一首歌谣《弹歌》，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说明。

原始形态的诗歌是由口头歌唱和传播的，有了文字之后才被记录了下来。我国现存最早而又较为可靠的诗歌总集就是《诗经》。它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共五百多年（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）复杂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。

《诗经》分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大部分，共三百零五篇。“风”又称“国风”，在“国风”所收一百六十篇作品中，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，虽经过整理和修改，但仍保存着民歌的特色，是《诗经》中的精华。

从形式上看，《诗经》中基本上是四言一句，句数不定，隔句用韵，押脚韵，虚词一般不押韵，不调平仄。有的诗篇只有一章（节），有的二、三章（节）以上。常常运用重迭词句。这种章句的重迭，与音乐有关，同时也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性、节奏感；反复吟诵，可增强艺术的感染力。

《诗经》的表现手法被古人归纳为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三种。其中，“国风”多用比、兴，“大雅”多用“赋”。“赋”是直接陈叙；“比”是比喻；“兴”是以他事引起下文，为诗章的开端，与内容不一定有什么联系。

时至战国（公元前403——公元前221年），最重要的诗歌就是“楚辞”。楚是战国时期南方的大国，它很早就接受了殷、周的文化影响，巫风盛行，神话传说丰富，乐歌也十分发达，这些都表现了楚国文化的特色。春秋战国时代，由于楚国疆域的扩大，它与中原各国政治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日益频繁，又引起了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，汇成新的巨流。“楚辞”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。

“楚辞”是一种形式自由、句法散文化、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的新体诗。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是句中或句末多用“兮”字，这本是向楚地民歌学习来的形式，也可能与南音和楚音有关。“楚辞”的代表作家是屈原，屈原的杰作首推“离骚”，它是长达三百七十多句、二千五百多字的自叙性长篇叙事诗。本书选了《九歌》中的《国殇》。

两汉时期（公元206——公元220年）的诗歌，又出现了“乐府”和古诗两种新形式。乐府的原始意义，本指两汉的音乐机关，乐即音乐，府即官府。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歌词也叫“乐府”，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名称一变而为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，并产生了文人模拟汉乐府的作品。至唐代，则已撇开音乐，专注重它的社会内容，如白居易的《新乐府》就不再入乐，又一变而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。宋元以后，也称词曲为“乐府”。

汉初惠帝时已有“乐府令”，到武帝又扩充为大规模的

专署，对民歌进行广泛的搜集。统治者搜集民歌的目的是为了娱乐，但也有“观风俗，知薄厚”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意图。在客观上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。汉乐府诗中的民歌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、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三类之中。从音乐上说，“相和歌”、“鼓吹曲”各具特色。相和来自民间“俗乐”，所谓相和，是一种演唱方式。含有“丝竹更相和”和“人声相和”两种情思。鼓吹则吸收了北方民族的新声，当时主要作军乐。杂曲只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。乐府诗的标题，有的加上歌、行、歌行、引、曲、吟等名称，也有不加这些名称的。

在两汉乐府中，本书选了《江南》、《枯鱼过河泣》、《十五从军征》、《东门行》等。

汉乐府民歌最大、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，并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。东汉末年产生的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。它的主要形式是杂言体和五言体。五言体向后的影响比杂言体更大，从东汉初年开始的文人拟作的五言诗，即导源于乐府，到汉末建安时期，五言体已取代了《诗经》的四言和《楚辞》的骚体，一直成为我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而存在。

东汉（公元25年——公元220年）的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《咏史》，可能是文人拟作的最早的五言诗。大约在东汉中后期出现的无名氏作品《古诗十九首》，标志着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，被称为“五言之冠冕”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
这种五言古诗是五言一句（行），每句（行）三或二

顿，行数不定，押脚韵，押韵可平可仄，可以通韵，可以换韵，不一定调平仄。

七言古诗始于东汉末年而成熟于唐初。七言一句（行），每句（行）四或三顿，余同五古。

五言古诗中有时也杂有三言或七言的，七言古诗中有时也杂有三言或五言的。此外还有六言古诗，由于节奏的关系，没有发展起来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（公元220年——公元589年）成就较大的诗人，有三国时的曹操、曹丕、曹植父子，王粲，晋代的陶渊明，南北朝的鲍照、谢朓等。本书所选的北朝民歌《木兰诗》，是可以和《孔雀东南飞》前后媲美的杰作。

与古诗相对而言的，又有近体诗。近体诗中又包括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、排律等形式，都是在唐初（公元618年以后）正式形成的。

五言绝句的格律是：每首四句（行），每句（行）五言，共20字；每字平仄有一定，二、四两句隔句押韵，押平声韵，不许通韵，不许换韵；句或对偶或不对，读成四或二顿。五绝中的古体可以押仄声韵，每字平仄不一定。

七言绝句的格律是：每首四句（行），每句（行）七言，共28字；一、二、四句押韵；其余平仄、押韵、对偶同五绝的规定；一、三、五字的平仄可以不论，二、四、六字必须分明；读成四或二顿。

五言律诗的格律是：每首八句（行），分四联，每句（行）五字，共四十字；每字平仄有一定，中间两联要对偶；二、四、六、八隔句押韵，只许押平声韵，不许通韵或换韵；全首以尽量不用相同的字为好；读成四或二顿。五律

中也有第一句也押韵的，称为变格。

七言律诗的格律是：每首八句（行），分四联，每句（行）七字，共五十六字；第一句也押韵；余同五律规定；读成四或二顿。无论五律或七律，也有三联对偶和四联全对的，也有只对两联的，都属于变格。也适用一、三、五字平仄声不论的变通办法。

排律被使用的不多，没有发展起来。

本书所选的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是五绝；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是七绝；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是五律；杜甫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是七律。

唐代是诗体具备、诗人辈出的诗歌极为繁荣兴盛的时代。唐初诗人以王勃、陈子昂的成就较大。初、盛唐（公元618年——公元765年）基本上分为四个大派别：以高适、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；以王维、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；以李白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派，和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等。他们都是向上继承了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、《乐府》的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优良传统，而又各有所发展，并向后分别对诗歌创作起着巨大的影响。

中唐时期（公元766年——公元835年）以白居易的成就最为突出，还有刘禹锡、李贺等。晚唐（公元836年——公元907年）则以杜牧、李商隐较为著名。

词是一种与音乐密切结合的诗体，是继承乐府之后在唐代新兴的形式。它起源于民间，而盛行于五代、两宋（公元907年——公元1279年）。词的兴盛主要是工商业发展，经济繁荣、都市和市民阶层形成后的产物。

词的调名、体段、格律、押韵等，都有一定的规定。词

本是依乐谱而填字的歌词。因而就可以乐谱的调名为名，如《浣溪沙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，后来也有取诗词名句作为调名的，如《渔家傲》、《南乡子》等。词调有的与内容相关，有的则与内容不一定相关，另加标题。过去习惯上依调名的字数多少加以分类：五十八字以内的为“小令”，五十九字到九十字为“中调”，九十一字以上为“长调”。“中调”和“长调”又称“慢词”。词调中最短的是《竹枝》，只有十四字；最长的是《莺啼序》，二百四十字。

词的体段：词有单调、双迭、三迭、四迭之分。单调只一段，多为小令，如《忆江南》、《浪淘沙》等。双迭由句数、字数相同或不同的两段构成。段也称阕、也叫片。两段称上段、下段；或称上半阕、下半阕；或称前阕、后阕；或称上片、下片。双迭的词调被使用的较普遍，如《念奴娇》、《满江红》等皆是。三迭、四迭由三段或四段构成，各段同式或不同式。

词的格律：词调各有其定格，以配合歌谱。每一词调的字数、平仄、句逗、韵式等都有规定，必须依词谱来填词。

词的押韵：词韵比诗韵放宽了韵部，又放宽了四声的限制，可以平声独押，入声独押，上、去通押；也有平、上、去通押的。一调之内，又可以一再换韵。

宋诗除了继承唐以前的现实主义、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之外，由于社会时代，政治经济，以及文化生活和语言等因素的变化发展，具备了一些不同于唐诗的特点，这主要是：散文化、多议论、语言通俗和写景题画小诗的发达等。

北宋（公元960年——公元1126年）诗人中以欧阳修、梅尧臣、王安石、苏轼等大家为杰出，到了南宋（公元1127

年——公元1279年），又产生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。词人中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，南宋的伟大爱国词人辛弃疾把这一词派推向了高峰。此外，还有北宋的柳永、秦观，南北宋之交的杰出女词人李清照，和南宋后期的姜夔、张炎等。两宋作家中如苏轼、陆游等，多数是既写诗又写词的。

元明清和近代（公元1280年——公元1911年）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、戏曲的时代。诗、词的形式虽也被文人们所继续使用，作者的数量和作品的产量也是很多的，但就其总的情况来说，已失去了所谓唐诗、宋词的蓬勃势头。本书也分别各选了一部分。

诗词之外，从元代（公元1280年——公元1368年）又产生了曲。曲主要是由词变化而来的。词到南宋末年，由于作者过于追求格律和词藻，使词的形式逐渐僵化，不利于反映现实生活。于是在宋元民间乐曲的基础上，更创新声，以便合乐来歌唱，用来充分地反映现实生活。曲有曲调、曲词，是供歌唱表演用的。

曲有散曲和剧曲两类。只供吟诵歌唱的曲称散曲；包括唱、科（表演动作）、白（说白）。而供演出的剧本称剧曲。

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。小令是短小的曲，是曲中最小的单位，正如诗的一首、词的一阕。小令只用一个曲调（曲牌），一韵到底，结构单纯。但曲的每字须分清平、上、去三声，以便于入乐。曲子押韵更合于口语，曲韵只分十九部，大致和今天北京语音相同。套数由二首以上同宫调的曲牌联成一套，有首有尾，全套首尾必押同部的韵。套数有北曲套数、南曲套数、南北合套等。

我国古典诗词丰富多采，源远流长。为了帮助中小学同

学更好地学习古典诗词，提高文学修养，丰富历史知识，培养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，本书按先秦、两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金、元明清和近代的历史发展顺序，从历代大量的诗词中，精选了思想内容积极健康、艺术水平较高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百八十篇，分上、下两册出版。现行中小学课本中选入的古典诗词大多包括在内。对入选诗词的作者都作了简要的介绍，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进行了分析，并分别作了较简明的注释和串讲。本书上册包括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的诗词作品共九十五首，下册包括宋金至近代的诗词作品共八十五首。如有不当之处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次韵竟方杨花

倚栏人正怅斜晖，待证前因旋觉非。
自隔银墙迷近远，苦从汀鹭较轻肥。
高楼客散翻疑梦，永昼诗成只掩扉。
看尔纷忙能几日，一春心事又花飞。

（一九三六年）

文言文教学的“批判继承、古为今用”问题

一

在全国制中学的语文课本中，前后共选用了一百五十多篇文言文，这些文言文的绝大部分，都属于古典作品。在讲解这些古典作品的时候，必须遵照马克思主义的“批判继承、古为今用”的精神，对教材作出实事求是、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处理，突出其中的积极部分，批判其中的消极部分，藉以对学生进行健康的思想政治教育。

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用的文言文篇目，都是经过有关机关和专家们反复研究探讨后才提出来的。事实上这些篇目也都是历史上的名作，精华较多而糟粕较少。但，历史上任何杰出的作品，也会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，尤其是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家，更不可能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反映当时的现实。任何优秀的作品，只能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，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精神、艺术标准，都有着其不同程度的距离。因此，即使对于精华性的作品，我们也必须指出那些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思想，哪一些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，哪一些已不再适用于今天，有的甚至变成了反动的东

西。这样，才会在语文教学的活动中，抵制住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的侵袭，使革命的思想完全占领着这块重要的阵地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说：“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；所以毫不奇怪，在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。”毛主席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也曾这样说过：“不把这种东西（谨按：指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）打倒，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。不破不立，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。”根据同样的精神，周扬同志在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》一文中，又作了以下的阐发：“只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判断，才能从历史遗产中分辨出什么是精华，什么是糟粕，以便于我们去存取舍。”接着，他又特别这样指出说：“遗产中的精华，也只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，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，才能成为对我们今天有意义的东西。”这些话，就是我们对待古典作品，即使是精华的东西，也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理论上的主要依据。

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又说：“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演进的。”而阶级社会中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，都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，必然要打上阶级的烙印。我们评价、解释历史作家和作品的时候，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。因此，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，亦即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，来分析评价古典文学作品，从而达到“古为今用”的目的。

进一步说，在加强基础教学的同时，既必须突出字词句篇的讲解，而伴随着字词句篇的讲解，作品的思想内容就更

易于显露出来，从而给学生以深刻的感染。这就更向我们提出了重视理论分析的必要性。有人说，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，只是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，作为一种工具，作品思想内容的批判与否，关系不大。这种看法，是很值得商讨的。不错，语言文字的本身是一种工具，但，语言文字这种工具，主要是用它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，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，没有一篇是不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的。为此，我们在讲解这些文言文时，即使你主观上想尽力去回避思想内容不谈，也是不可能作得到的。在课堂上，多进行字词句篇的讲解，少进行思想内容的分析，避免把语文课讲成政治或文学课，那是完全可以的，也是很应该的。然而，少分析思想内容，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进行必要的批判，这乃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，不容混为一谈。任何借口加强字词句篇的讲解，而忽视或放弃对思想内容分析批判的作法，都是与“批判继承、古为今用”的精神背道而驰的。

在中学语文课本前后所选用的文言文中，都有哪些篇目的思想内容需要批判呢？这是我们对这些作品进行理论分析时必须首先加以明确的问题。关于这一类的篇目，经初步归纳，可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：

1、宣扬封建儒家的王道、仁政思想和道统观点。如：《孟子·齐桓晋文之事》的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“今王发政施仁”；韩愈《师说》的“吾师道也”、“道之所存”。等等。

2、忠君思想和清官思想。这以《海瑞传》表现得最为突出。此外，如《出师表》中诸葛亮的“此臣之所报先帝而